

#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48

2011年9月19日

\*\*\*\*\*

## 重建歷史文化觀 重溫新民主主義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特約研究員 楊松林

張木生先生新作《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sup>1</sup> 對傳統史學觀提出了挑戰，最後提出中國重新回到新民主主義，震動了中國思想界。主流紛紛找張木生“對話”。吳思先生認為“支持這套政策的理論本身說服力有問題，存在著問題，你得經得住人民問”，先擺出朱厚澤先生的三問，自己又加兩問。<sup>2</sup> 也有人呼籲張木生，“聽聽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吧”。<sup>3</sup> 讀完張木生的書和幾次對話記錄稿，深感不建立新的歷史文化觀，很多事情確實看不清楚。

---

<sup>1</sup> 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香港大風出版社 2010 年。

<sup>2</sup> 吳思：〈新民主主義在當代的問題和出路〉，《中國改革》2011 年第 7 期。

<sup>3</sup> 高寒：〈撥亂反正與民主社會主義〉，新浪博客 2011 年 7 月 28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3ce390100vq49.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3ce390100vq49.html))。

## 文化歷史觀決定觀察角度和結論

“中國向何處去”是1840年以來一直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問題。十月革命讓一些知識分子認為問題解決了，隨著蘇東和中國放棄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重新陷入迷惘。雖然如此，對一部分人來講似乎從來不是問題：放著現成大國崛起的樣板探討“何處去”很愚昧。可對另一部分人來講這一直是件麻煩事兒。張木生“重歸新民主主義”，90%的篇章在探討歷史文化觀，王小強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寫到第四部分20多萬字了還在審視中外歷史，不曉得到第幾部分才能入正題。說不清是道理不夠學問湊，東拉西扯，還是題目太大戰戰兢兢，過於謹慎。

學者不是算命仙，對於未來和未知沒法靠生辰八字手紋黑痣就做出結論。有人說經濟學不是理論，只能從讀歷史讀出道道來。其實政治學和各種人文學科離開對歷史文化的觀察和判讀也說不清楚。當注意到現成的解釋與歷史事實不斷出現顛覆性的衝突後，不搞清楚歷史還真說不清楚現實。

我理解張木生和王小強的難處。撿現成的，一個階段論，一個終極論。聯共黨史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類歷史分五個階段步步高，這種看法一直是中國官方基本看法；另一個看法是西方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是普世價值，代表了人類發展基本方向，歷史因全球西方化而終結。無論哪個都有理論有實踐，都在昭示中國向何處去。只能二選一，頂多添個“初級階段”或者變通為“民主社會主義”。可是，歷史是一堆實實在在的事實和它們之間關係。僅憑起個名字或者外號就打算說清楚，看起來輕鬆，實際是輕率。無論徐倬雲、趙剛、李零、張木生還是王小強都很早注意到從字面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在中國早就不存在，卻沒敢給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起個名字。在他們的描述中，兩千年來的中國經濟形態是小農加市場，社會形態是大一

統，政治制度中央集權。究竟叫什麼不重要。木生認為還叫封建社會也不妨是重實不重名的態度——因為名字要約定俗成。道理很簡單：任一社會形態都是個系統，包括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它們之間關係等各方面的描述，“一家之言”不是動一個詞就說清楚的。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無論堅持階段論還是終極論的，似乎都沒有計劃根據這些新觀察搭建一個新的敘述體系。在評論張木生大篇幅論述時，要麼說“我們在30年前的時候基本已經達到這個水平了”、這“不算顛覆性的”、只在“對批評‘西方中心論’是有意義的”、這個矛盾與“今天下一步怎麼發展關係並不大”……虛晃一槍；要麼用“這裡只討論……”罔顧左右。<sup>4</sup>這讓我想起王小強就這個問題明火執仗PK秦暉，整個主流學者群假裝沒看見時的尷尬。

簡單總結一下這些年學者們對歷史的新觀察：如果封建社會是指分封建制，經濟的主體是貴族莊園，君主賜予和褫奪決定地權變更，被分為貴族、農奴和自由民等基本不交叉的階級，作為人群主體的農奴沒有自由身份，政治上分權，君主與貴族協商處理公共事務，那麼西方中世紀到18世紀符合封建社會的描述，但中國早在秦漢以來主體經濟社會形態就不是這個樣子了。自秦以後中國經濟主體是小農經濟（無論處於佃農、雇農、中農還是地主狀態，家庭經濟是獨立的），主要生產資料自由買賣，所有人都是皇帝的編戶齊民，政治上大一統的中央集權。

對於以上描述，目前多數學者都承認。但到此為止還不能影響對傳統歷史觀有顛覆性衝擊。秦暉、楊奎松教授能從中國歷史上土地不像歐洲那樣高度集中得出中國古代社會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這與吳思的官家主義有點接近）而不是地主和農民的矛盾，往後分析共產黨

---

<sup>4</sup> 2011年6月22日李偉東、楊帆組織的“國際經濟形勢與中國發展戰略研討會”上一些與會者的發言。

的土地革命就有些缺少法理依據。同樣的事實，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sup>5</sup> 市場經濟自身就是個正反饋系統，兩極分化、經濟虛擬化趨勢無法逆轉，總是靠崩潰進行震蕩調整。結論只有共產黨鬧土地革命是歷史使命。兩者的區別是究竟講小道理還是講大道理，究竟擺部分事實還是擺全部事實。

一些學者<sup>6</sup> 進一步注意到：由於農業時期分工已經很發達，小農經濟體過小無法涵蓋社會分工，因此小農經濟必然伴隨大量經濟體之間的交換。這可以在大量歷史文獻中得到證實，表明中國古代社會是發育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西方中世紀數百甚至數千人的莊園經濟可以在經濟體內部涵蓋大部分分工，自給自足，因此經濟體內部類似計劃經濟，外部交換很小，基本生產資料不能買賣，屬於市場經濟發育很低的所謂自然經濟。兩者的差異還可以從西方缺少小面值貨幣、度量衡混亂得到佐證。

進一步分析，同一性的社會組織越大對市場經濟發育越有利，這構成了大一統和集權體制的邏輯條件。也可以在歐盟、東南亞聯盟包括全球化的成長中得到驗證。而自給自足的貴族莊園不依賴這個條件，這成為分權和協商政治的基礎。中國缺少統一的有權威的宗教，因為中國不靠它就有凝聚力。西方必須有統一有權威的宗教，因為少了它就缺少凝聚力。這也可以從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得到佐證。

如果這些敘述是真實的，那麼首先會對階段論造成衝擊：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都是農業社會，生產力大致接近，中國小農加市場與西方莊園加計劃的生產關係樣式，中國大一統的集權政治與西方分權的協商政治就截然相反。

接著對終極論形成衝擊：市場經濟顯然與民主政治不是天作之

---

<sup>5</sup> 楊松林：〈沒有土地改革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香港傳真》No.2009~38。

<sup>6</sup> 王小強在1999年寫的〈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最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前四部分中闡述了這個觀點（香港大風網站，<http://hkstrongwind.com/>）。

合的原配，反而與大一統和中央集權廝守數千年。

張木生通過李零變著法地強調這些邏輯，王小強引述大量史實來敘述這個過程。這些邏輯和敘述重點不是衝擊“西方中心論”，而是想提醒大家思考這樣兩個問題：市場經濟不見得與西式民主是天作之合的原配；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礎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維護的“國際慣例”和“普世價值”；中國兩千年經濟社會不斷震蕩崩潰在表明市場經濟並不像經濟學描繪的那樣可以自治、只存在週期性波動特性，而是有正反饋特性的體系。

歷史和它揭示的道理恐怕不是“與今天下一步怎麼發展關係並不大”。認識重歸新民主主義，解答五個疑問，都離不開對歷史的認識。甚至可以說，正是歷史文化觀的差別，決定了“中國向何處去”的不同主張和認識。

## 時代判斷錯了嗎？

吳思先生說朱厚澤先生對新民主主義理論基礎的幾問第一是“時代判斷就有問題。時代判斷是社會主義在興起，資本主義在衰落？是嗎，世界歷史已經證明，至少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在崩潰，而資本主義不斷地解決自己的問題，所以這個判斷有問題。不正視世界歷史這個問題，理論的解釋就會禁不住一問”。

可以先用問句回答這一問：“毛澤東是這樣論述時代性質的嗎？”

毛澤東用了很大篇幅論證為什麼中國革命已經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基本論述是：中國面臨一個反帝、反封建，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國家的革命。十月革命後“世界資本主義陣線已在地球的一角崩潰”，世界資本主義維護殖民統治更加瘋狂和堅決，而社會主義國家堅決支持和支援被壓迫民族的革命。由此這種革命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即新民主主義的、“為社會主義發展掃清更大道路”的革

命。文章對時代性質判斷的原話是：這是“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不能活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它願意為了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並沒有“社會主義在興起，資本主義在衰落”的內容。邏輯重點不是誰興起誰衰落（總共捎帶了一句“一角崩塌”），而是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矛盾的內容和性質。

如果承認毛澤東關於時代性質是這樣敘述的，那麼還可以問一句：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非更加依賴”他們建立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秩序掠奪發展中國家財富，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思想、文化便“不能活”的性質變了嗎？發展中國家努力擺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剝削、政治干預、軍事威脅的鬥爭性質變了嗎？

回到歷史文化觀，資本主義的外延和內涵也是需要重新討論的。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sup>7</sup> 制度，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社會財富借助僱傭勞動的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資本、勞動力、商品和服務借助貨幣在市場裡自由流通。自由競爭，市場人根據自己利益自由決定行為。

符合這種標準的顯然包括古代中國小農加市場經濟，中世紀歐洲則不符合這個標準。實際上，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和 1500 年以後的西方國家也不符合這個標準，而是更接近帝國主義的概念。帝國主義的核心不在於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樣式，而在於通過建立一套霸權體制從其他國家以非經濟手段攫取財富，帝國主義經濟是在一個包括通過霸權維護的整個經濟圈構成的。這樣古希臘、古羅馬、蒙古帝國等才被稱為帝國主義。從 1500 年到 19 世紀初，西方列強的主要財富來自對殖民地的掠奪。早期的貿易利潤的源頭是掠奪拉美殖民地白

---

<sup>7</sup> 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在定義上非常接近。資本主義經濟定義中一般增加了大生產等內容，但這很難成為本質性區別。百度百科解釋的市場經濟中就有“市場經濟也被用作資本主義的同義詞”。

銀，中後期來自對非洲黑人的販賣和美洲奴隸勞動，這都不符合市場經濟的標準。大工業出現時期，國內無產者剩餘價值確實是主要財富來源，但同樣離開殖民地的資源和市場也“便不能活”。

二戰以後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是不是一個基本符合資本主義性質的資本主義世界建立了呢？其實不然。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通過建立一套以暴力威脅、政治干涉、軍事干預、文化滲透為基礎的世界經濟體系，依然明顯地以非經濟手段掠奪發展中國家財富。

在 20 世紀 90 年代以前，主要製造業產品還是發達國家生產的。到現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已經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除汽車、飛機、發電量外的絕大部分工業品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當然，究竟美國等發達國家所建立的“國際慣例”是怎樣把財富攫取到自己手中，還沒有人專門論述。但總能看出些貓膩：

中國人這十幾年應該是全球幹勁兒最大、經濟成就最大的國家。2000 年，符合勞動條件的人中，中國有 77.8% 的人願意參加社會勞動，比世界平均值高出 18.6%，比發達國家高出 27.5%。其中婦女比發達國家高出 42%，真是“人人都動兩隻手，不願在家吃閑飯”。不要以為中國這些就業人都是農民，創造不了多少物質財富。2006 年中國從事第二產業的勞動者多達 1.2754 億人，比 G7 國家的 9350 萬高出 36.4%。<sup>8</sup> 最主要的是，這些人中的大部分每週勞動時間超過 55 小時，總勞動時間接近西方七國第二產業勞動時間的兩倍。進入 21 世紀，中國大部分製造業所用的技術裝備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勞動生產率並不比西方國家工人低到那裡。到目前，中國人均生產的製造業產品（注意：是“人均”）絕大多數高於發達國家，這可以從全世界超市裡大部分產品都是中國製造得到印證。研討會上多數發言

---

<sup>8</sup> 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 2005 / 按產業類型分的就業構成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者也承認“中國製造能力世界第一”。

但明擺著的是：中國人與發達國家普通人生活水平差得不是一點點，而且差距並沒有因為上面原因而縮小多少。購買力平價法是世界銀行根據各國貨幣實際購買力的經濟分析數字。按購買力平價法“國際元”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接近不同國家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1997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3220國際元，相當於美國2.908萬國際元的11.1%。十年後的2007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人均國民收入5370國際元。但製造業份額已經不足國內生產總值14%的美國人均國民收入4.585萬國際元，中國相當於美國的11.8%。輝煌十年差距縮小6.3%（而這些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0.6%，發達國家0.7%）。<sup>9</sup>最終形成的“中~美國”是這個世界是縮影：中國人生產，美國人消費。這基本是古代美塞尼亞人與斯巴達人之間關係的翻版。

看清楚的是美元霸權，美國人通過印鈔票借錢買幸福生活的道理連美國人都看出來了。但這僅僅是一小部分。

為什麼西方將知識產權放在國際慣例的第一位？因為技術專利和名牌商品和服務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手裡。專利規則和品牌規則能獲取高額利潤，是按正反饋運行：利潤越高吸引人才能力越強，投入眼球經濟的能力越強，於是技術優勢更高，品牌價值更大。每年通過知識產權規則獲取的財富是發達國家財富的重要來源。

很難看出賭博經濟（也叫虛擬經濟）會給西方人帶來什麼額外收入。願賭服輸嘛。但看看下面數字就會有些疑惑：

1970年，美國人均工薪收入5515美元。其中來自金融保險業994美元，佔18%；個人股息和利息收入915美元；來自金融業務收入

---

<sup>9</sup> 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 1999、2009 / 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總計 1909 美元，佔個人收入的 23%。到 1998 年，美國人來自金融業收入佔工薪收入比重達到 36%，擴大整整一倍。加上利息股息收入，來自金融收入佔個人總收入份額為 35.4%。<sup>10</sup> 賭博~虛擬經濟是美國個人收入增長基本帶動力量，已經是美國人須臾不可離的收入來源。這是實實在在的美元霸權的作用。

所以說，西方發達國家的帝國主義性質沒有變，區別只是由領土佔領變為“沒有帝國的帝國主義”而已。

資本主義國家當然要“不斷解決自己的問題”。但解決方案全部是加大政府干預分配的力度，緩解國內矛盾。沒有，也一點沒打算解決毛澤東所提出的問題，甚至更加變本加厲。只是掠奪壓迫的對象從原來叫“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改為“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罷了。

討論時代性質還離不開這個出發點：資本主義衰落了也罷，正在興盛也罷，討論的出發點是“中國強國戰略”而不是“美國霸權戰略”。就算資本主義陣營還沒衰落，甚至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上依然處於強勢，作為被這個陣營所掠奪和欺凌的對象，只能促進他們的衰落而不是讚嘆他們的興盛。

打算“戰”才需要“戰略”，為了“戰”才產生“戰略”。

除了冷戰期間西方陣營的前沿部分小國在西方資助下實現了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大國，根本沒希望邁進那個門檻。20 世紀 60~80 年代，墨西哥曾經為世界第 13 經濟大國。巴西 1960~1980 年 GDP 翻了四番成為世界第七經濟大國，人均國民收入超過原宗主國葡萄牙。而阿根廷更是在 80 年代初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七千美元，比宗主國西班牙還高。眼看這他們一隻腳就要踏

---

<sup>10</sup> 中國統計信息網：美國統計摘要 1990、1995、1999 年 / 美國個人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個人可支配收入（[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0/t20020205\\_402192502.htm](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0/t20020205_402192502.htm)）。

進發達國家門檻裡了，全球經濟學家一起驚呼經濟奇蹟。90年代初和新世紀之交前後這些國家兩次發生嚴重金融、經濟危機，從此社會震蕩，經濟破敗，大量民族企業破產，金融等大部分命脈產業被西方徹底控制。整個90年代這些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從以前的兩位數下降到2~4%，到新世紀更是下降到2%左右。<sup>11</sup> 國內農民起義都鎮壓不下去，黑社會禁不住，社會動蕩不已，再也不做什麼跨入發達國家門檻的夢了。拉美大國如此，亞洲的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也如此。

1980~2000年是發展中國家高速工業化時期，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含中國）工業化速度和經濟增長速度遠高於發達國家。那麼，是不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有可能“長入”發達國家呢？看看世界銀行數字就知道了（見表~1）。

表~1：1980~2000年各類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單位：美元）

年份	1980	1990	2000
世界平均	2540	4090	5263
低收入國家	370	430	420
中等收入國家	1110	1360	1388
高收入國家	10810	20630	25986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 2001、2004 / 以美元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20年中，低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長0.64%，其中90年代是負增長，完全被這個世界邊緣化；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在內的中等收入國家年均增長1.12%；高收入國家年均增長4.48%。興致衝衝的新興市場國家並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距離。1980年他們的人均收入是發達國家的10.27%，1990年只佔到6.59%，2000年繼續縮小到5.34%。新興市場國家經過20年努力，一個個興奮不已，但回頭一看數字，竟然比20年前差距擴大近一倍！金融風暴期間雖然有些逆

<sup>11</sup> 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 1997、2008 / 居民收入分配（<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轉，但大的趨勢沒有變化。

投入全球化的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尷尬是：本幣升值，出口困難；本幣貶值，價值流失。美元貶值，外匯儲備縮水；美元升值，國內財富縮水。怎麼也討不到好。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按本幣計算的 GDP 比美國增長快幾倍，卻在美元不斷從印鈔機中印出來的過程中拉大了以美元計算人均 GDP 的差距。

中國最輝煌的十年中從實際收入相當於美國的 11.1% 擴大到 11.8%。照這個速度中國要 150 年才能達到美國人生活水平，這還沒說所有新興市場國家都遭受過一次以上的金融洗劫，中國肯定免疫？！

張木生對這個形勢本來就講清楚了：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沒有了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沒法存在。13 億中國人變成發達國家，全世界人民都笑了。

蘇東反水，中國改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確實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上增強了優勢。今天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能夠不生產財富而享受財富，把精力都用在打造利器維持“世界秩序”和“全球共識”上，雖然已經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但大格局沒有變。1940 年新民主主義論講演到現在，無論叫改革還是叫革命，時代的性質也沒變。這個時代依然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手段掠奪、壓迫、奴化、威脅發展中國家的時代，發展中國家努力擺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掠奪、政治壓迫和軍事威脅的時代。出發點不同當然結論不同，作為一個不斷被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剝削、政治壓迫、軍事威脅的對象，只能這樣判斷。難道我們的理論界能得出與此相反的判斷？

西方資本主義會不會萬古長青，全球化市場經濟是不是能解決所有問題，看短線是看不出來的。

## 共產黨執政合法性來自哪裡

張木生提出重歸新民主主義，市場經濟、私人資本、開放搞活都有，黨外有黨黨內有派，言論自由，參加討論的人紛紛表示可以接受，不少人還認為與謝濤、陳志忠的主張接近。甚至對中國革命的合理性、共產黨獲取執政的正當性也取得接近的共識。但是有一點似乎很難一致，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方向和由此引出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

吳思的第二個問題是：“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的依據有問題。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自己的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這個結論對不對？”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實際就是共產黨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力量的政治格局。核心問題是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由於問題敏感，無論朱厚澤還是吳思都無法把道理說透。但高寒直指要害：“新民主主義論的要害，乃是共產黨的天然領導權”。<sup>12</sup>

說實話，現在這個問題還真不好解釋。如果共產黨自己都討論“告別革命”，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那麼為什麼非共產黨執政不可就不能理直氣壯。

說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完成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順應天理民意，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強盜理論。

說解放初只有國有化、集體化、集中體制才能實現中國人快速工業化的百年夢想，社會主義道路被寫入憲法。由於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後要搞社會主義，因此只能共產黨執政，也是一個說得通的道理。

---

<sup>12</sup> 高寒：〈撥亂反正與民主社會主義〉，新浪博客2011年7月2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3ce390100vq49.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3ce390100vq49.html))。

但是，假如中國要與西方經濟制度接軌，無論是接美國的還是接瑞典的，那麼政治制度一直不接軌就說不通了。願意與西方經濟制度接軌的階級、階層和政治團體多了去了，並非“無產階級政黨”一家。要做執政黨，就要有黨派法，就得與所有主張市場經濟、政治民主的政黨競爭上崗。憑什麼只有共產黨夠執政資格？

說自己這些年領導得好，經濟成長取得傲視全球的成績也不算數：日本自民黨領導得一直很好，也創造經濟奇蹟，怎麼也會下臺？李家父子把新加坡治理得那麼好，人民行動黨照樣要面臨多黨競爭。如果到了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出現動蕩的時期，這個理由說不出來了怎麼辦？

60年大慶、90年誕辰，電影電視都在展示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蔣介石獨裁的偉大成績。但說來說去，無非是犧牲了幾千萬，付出了多大代價，整個一個打天下坐天下的道理。這個道理與中國幾千年農民起義的道理並沒本質區別，大不了一個“你有本事你再奪下來”的邏輯。可人家不見得非要動刀動槍，讓你自己易幟有現成的一大堆例子。

我的看法是：如果單就執政“合法”性來講，現在共產黨執政不存在問題。因為《憲法》第一章第一條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執政合法性來自中國憲法，不是美國憲法或其他國家憲法。由於憲法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那麼縱觀中國現在所有政治勢力，只有中國共產黨黨章裡明確宣佈贊同這個內容，其他政治勢力都不完全贊同甚至反對這個內容。因此，中國只能共產黨執政。

這並不是一個讓人口服心服的理由。真正說清楚還很費口舌。因

為這裡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憑什麼中國非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可”；另一個是“憑什麼要把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寫在憲法中，讓共產黨成為惟一可以執政的政黨”。

我的看法是，首先，中國不可能實行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帝國主義制度；其次，其他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所謂“資本主義制度”的結局都不好。也可以說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早已沒有了生存空間（這一點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已經闡述）。發展中國家走資本主義，結局是一種經濟上接受帝國主義剝削，軍事上忍受帝國主義威脅，政治、文化上依附帝國主義的新型“半殖民地制度”，一種“永世不得翻身”的制度。近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提供了充分的例證。

中國只有做到政治上不依附於帝國主義，經濟上降低直至隔絕國際資本的剝削，文化上減弱帝國主義奴化，軍事上不怕帝國主義威脅，才能打破現有“一球兩治”的格局，使中國走向繁榮富強。這樣的道路，實際上是新民主主義性質，也就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實現真正的獨立，節制資本，維護勞動者利益。從長遠看，這條道路會逐步增加社會主義性質。因此，把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中國憲法內容是時代特性決定的。

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的主流精英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表現出政治上傾向於依附帝國主義，經濟上依賴西方經濟，反對節制資本而主張放任資本，全盤接受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軍事上主張軟弱退讓。他們這些主張只能讓中國掉進萬劫不復的拉美化泥潭。

上面提出一個“已經沒有純粹資本主義的生存空間”的判斷。這個判斷真實嗎？起碼對大國來講是真實的。

從歷史看，19世紀初西方列強完成初步全球化，其他大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個是自己變成帝國主義國家，一個是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但是成功躋身帝國主義的大國只有日本和美國，其他的都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沒有一個成為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二戰後

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獨立，依然兩條路：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是所謂發展中國家。但發展中國家也沒有一個是典型資本主義制度，經濟上要麼完全依附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受發達國家掠奪，其他的即使不依附，經濟上也受帝國主義國家掠奪，沒有一個通過走資本主義使經濟上靠近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走資本主義的結局都將回歸新型殖民地”甚至可看做是個全稱判斷。

有些人會說，還有四小龍。四小龍的產生是冷戰結果。就像張木生說的一塊硬幣，他們是錢幣邊緣部分，是美國為了冷戰可以讓出的一部分利益。但是作為原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國，美國就是想割掉一塊利益也割不起。佔人口 20%的發達國家如果讓中國、印度兩國任一進入他們的圈子，世界就不是二八開而是四六開，得兩個地球的資源才能維持。兩個都擠入，倒六四加三個地球。毛澤東和他的團隊在 1940 年就看出這樣一個世界格局，只能說是天才判斷。

新民主主義必須共產黨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理由是這樣的：

時代沒有根本變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剝削、政治上壓迫、軍事上威脅、文化上奴化中國的基本規則沒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在各方面處於強勢。二戰後多數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道路選擇了市場經濟加所謂西式民主，這些國家無論經濟高速發展還是完全停滯，多數形成國內貧富分化嚴重，精英集團越來越依附和靠攏美國等發達國家，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與發達國家距離越拉越遠。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也證明，全身心投入全球化，搞徹頭徹尾的市場經濟，也導致經濟上受到嚴重非經濟剝削，國內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精英集團越來越依附和靠攏美國等發達國家，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與發達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因此，擺脫掠奪、兩頭在內、節制資本、共享經濟成果是中國擺脫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悲慘命運的最低標準。

從這些年情況看，中國私有資本和他們的精英代表並沒有這樣的主張。他們連孫中山的國家掌握金融、能源、交通、通訊等命脈行業

的節制資本主張都反對，一直不停的督促國企讓出命脈產業，就連溫州動車追尾，主流第一個反應就是攻擊國企壟斷。從來不講這些壟斷性產業國企退出後，他們是不是也只能壟斷，甚至不告訴大家最大可能是外資壟斷。資本家一點沒表現出希望的那種“道德血液”而是充分展現了無度的貪婪和無盡的瘋狂，使中國資本收益佔國民收入比重達到了驚人的份額。中國嚴重貧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均，他們的邏輯是國企高額利潤造成的，甚至歸結為國企職工工資太高。無視國企僅佔經濟 30% 的比重，而且無視所謂國有壟斷的工業行業中所有者權益利潤率低於工業平均值的事實，也不顧削減國企職工工資後勞動者報酬佔 GDP 份額必然下降的邏輯結果。他們政治上靠攏和依附美國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思想上接受他們的奴化教育。因此，代表官資學媒的主流精英不可能引導中國走向富強。

由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有這個主張，代表其他階級的政治團體沒有這個主張，因此，無論新民主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階段都只能共產黨領導。

在當今世界格局下，中國不可能“復辟資本主義”，因為自西方列強第一次實現全球化後就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機會。中國要復辟，只能復辟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經濟上外資、買辦資本、官僚資本佔主體，一個依附美國政府。甚至連這都不可能，而是掉進混亂、分裂的泥潭中。

一些知識精英包括“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中國應該走北歐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經濟上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前提，政府通過二次分配減少收入差距，政治上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經濟社會模式。這些國家基尼係數偏低，雖然經濟也不斷出現問題，但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富裕。

嚴格來講，用“民主社會主義”定義這些國家並不準確，如果還有個“帝國主義”概念，他們應該叫“民主資本主義”更合適。生產



資料私有制，資本主導一次分配，應該屬於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目前國內主流學者甚至政府也認為通過二次分配，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可以消除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動所有制能否實現“共同富裕”是需要下功夫分析的。

首先我們必須注意高福利的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等北歐四國都是人口不足千萬的小國寡民，四國總計約 2500 萬人口。同時，這些國家除了早年海盜生涯名譽不好，已經很長時間不依賴帝國方式生存，同時也從沒有成為殖民地。這些國家自身沒有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在整個歐洲社會分工中在很多行業上技術處於頂端。他們雖然不靠金融霸權生存，但通過知識產權規則，是“國際慣例”的受益者。他們在政治、軍事、文化上是美國的忠實盟友並得到庇護。

小跳蚤能跳自己身高的一百倍，但假如這個節肢動物同比例放大與人一樣，跳不到自己身高一倍腿就斷了。加強自己的節肢，體重又讓它難以克服地球吸引力。大與小不僅是比例問題，也是結構問題。

造成中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核心因素是城鄉差距。2009 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 333 比 100，接近 80 年代中期的兩倍。其中按五等份分法偏低的近六億農民年均收入只有 3158 元，是城鎮居民平均 1.7169 萬元的 18.4%，比城鎮 10% 最低收入群體還低四分之一，甚至低於困難戶（按王小魯的研究，這個差距還要大<sup>13</sup>），而且自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呈擴大趨勢。基尼係數低的國家，城鄉居民收入基本接近。不解決農民收入增長過慢中國就成不了瑞典。

如果要讓這六億多農民純收入水平與其餘六億多人通過二次分配拉平（僅解決城鄉差距，這是前提）。以 2009 年數字，就要從市民平均每人拿走七千元補給農民。這就涉及 4.2 萬億，佔當年 34 萬

---

<sup>13</sup> 王小魯：〈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百度文庫 2010 年 7 月 30 日（<http://wenku.baidu.com/view/464ae62acfc789eb172dc84e.html>）。

億 GDP 的 12.4%，佔當年 6.8 萬億財政收入的 62%。如果考慮到城鎮低收入群體的問題，這個數字不會低於六萬億。要命的是，由於農林牧漁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間小於二、三產業，因此現有差距會不斷擴大，這已經與體制無關，因為全世界都面臨這個問題。

90 年代後期開始的貧富分化不斷擴大，究竟主要與二次分配有關，還是與一次分配中資本收益份額擴大而勞動者報酬份額縮小有關。看看數字就知道了。1999 年，中國勞動者報酬佔 GDP 份額為 52.0%，資本收益（折舊加營業盈餘）佔 35.7%，勞動與資本之比為 147 比 100。2007 年勞動者報酬份額下降到 39.7%，資本收益上昇到 45.4%，兩者比例變成 88 比 100。雖然同期財政收入佔 GDP 份額和福利支出佔財政支出份額都明顯上昇，但居民消費佔 GDP 比重竟然只有 35%<sup>14</sup>（世界各國勞動者報酬佔 GDP 比重都小於居民消費佔 GDP 比重），大量財富用於資本形成（主要是高收入群體買房）。這個趨勢持續下去，用二次分配解決收入差距難度不斷加大。世界上所有基尼係數低的國家，首先是勞動者報酬份額大於資本收益份額，美國如此，瑞典也如此。歐盟勞動者報酬與資本收益之比為 118 比 100，日本為 132 比 100，美國 155 比 100，與中國 90 年代 147 比 100 接近，與中國 2007 年的 88 比 100 明顯相反。發達國家二次分配的建立是在一次分配已經是勞高資低基礎上實施的。中國做反向調整，在一次分配中擴大勞動者報酬份額，壓縮資本收益份額，本身就是“節制資本”。而且難度不小：如果調整到 1999 年水平，按今後 40 萬億 GDP 算，要從資本收益裡挖出 4.7 萬億調給勞動者報酬，佔資本收益的 25.8%，佔其中營業利潤的一半，給二三產業就業者每人每年平均增加 1.2 萬元勞動報酬。這麼大動作，差不多相當於一次“革命”！

---

<sup>14</sup> 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 2000、2008 / 國民經濟核算 / 各地收入法國民生產總值、支出法國民生產總值（<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主流也承認資本分配過多，不過認為這都是國企鬧的。但這種判斷要得到數字支持才行。

在經營性行業中，國有資本在農業中基本為零，第二產業中，國企僅完成 2007 年建築業總產值的 20.8%。工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完成增加值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的 34%。第三產業中國企在鐵路、通訊、金融佔主導，但這三個部門總計佔三產比重的 25.7%，其中還包含私營佔比重很大的公路運輸。國有經濟大約佔全部生產性行業 GDP 比重 30% 左右。私企和外企佔 70% 左右。

那麼是不是國企比重雖然低，但其壟斷經營，獲利水平高？實際上，2007 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所有者權益利潤率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為 15.7%，外企為 18.3%，私企達到 22.8%。<sup>15</sup>

因此，數字表明是私人和外國資本造成了資本收益擴張過快，勞動者報酬下降多。一次分配中存在的問題，顯然是沒有節制資本而是放任資本造成的。如果繼續放任資本，僅靠擴大二次分配解決貧富分化問題，等於不補船底窟窿只往外舀水。

而節制資本的任何做法，都是私人資本、外國資本、買辦資本和官僚資本（權貴資本？）所不樂意的，也是他們的代言人這些年來極力反對的，更不要說要加強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主張了。

因此，北歐模式在北歐四國可能有效，放在當今中國治不了病。

節制資本、共享成果，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即使這個綱領，在私有制為基礎的全球政治經濟中也屬於“革命”事項，中國沒有其他政治派別同意這條道路，沒有這樣的政治主張。在中國，只有共產黨主張社會主義，主張公有制。共產黨始終要扮演一個“執政的革命黨”的角色。

正是因為中國必須走最終目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新民主主義才

---

<sup>15</sup> 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 2008 / 工業 /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經濟指標（<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能富強，因此憲法就要寫清楚這些內容。如果其他黨派遵守憲法，“合法執政”，黨綱就必須明確寫上“主張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競選綱領就要提出如何按社會主義原則解決當前問題的主張。

接著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不按公民社會原則辦，非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公民政治地位分出個順序差別呢？

問題在於，公民身份的政治經濟地位在私有制存在情況下，會不會有實際上的差別呢？這些年政策上沒差別了，可工人、農民成了“弱勢群體”，經濟地位低不說，政治地位簡直說不上。按胡潤說的，現在兩會“126 個代表是十億以上的富翁，農民工代表一共才三個”。按胡潤公佈中國超過十億富翁 2600 人計算，富翁每 21 個人一個代表，農民工每 6666.6667 萬個人一個代表。新民主主義社會保留私有制和資本家，富人肯定強勢。加上在全球帝國主義文化強勢下，知識分子根子裡向西方價值觀傾斜，工人和農民必然逐漸趨於弱勢。政府官員要負責發展，自然要與資本親近。當年有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制度，一個縣長一年起碼要與普通工農吃一個月飯。現在除了陪老闆，從上任到卸職一次都不會。

實際公平是靠程序公平實現的，只要存在私有制，程序上大家擺一排，結果肯定工農成弱勢群體。工農擺前面程序上不公平，但實際趨向公平。當然，在當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是否大家擺一排更合理，可以探討。無論按現在的實際狀況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恰好都要把工農擺前面。只有實現社會主義，所有人才適合擺一排。

### 客觀評價社會主義實踐是討論新民主主義的基礎

按照〈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後面是社會主義。張木生沒有特意強調，但屬“題內應有之義”。吳思先生用朱厚澤先生的話問：“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假定是人類最後走向社會主義，中國已經搞

了三大改造、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社會主義還要再來一遍嗎？這樣的未來是值得爭取的嗎？”

吳思先生這句話包含兩個內容。一個是 1956 年以後到改革前的經濟社會制度是壞制度。這與一些與會者：<sup>16</sup> 毛澤東“沒有提供一個好的工業化的道路”、“選擇社會模式的失敗”、“農民打不下糧食來，工業這麼嚴重虧損，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又受到了大影響”、“歷史橫向比較，文革期間降到了民國以下”的基本判斷一致。一個是所謂社會主義就是“三大改造、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在抗戰期間提出新民主主義，共產黨在解放區實行聯合政府、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新民主主義政策，直到解放初還說資本主義要保留幾十年。到 1956 年突然不算了，走三大改造、計劃經濟、人民公社。與斯大林在 1928 年放棄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實行國有化和集體農莊性質接近。對於共產黨做這個選擇的理由，大部分評價是負面的：出爾反爾，最終失敗。如果這個理由被張木生接受，去掉社會主義方向，重歸的“新民主主義”，對很多人來講自然有益無害。

可是歷史終歸是歷史，斯大林和毛澤東面對同樣落後的農業大國都選擇了國有化加計劃經濟和高度集中體制，不能說是歷史的偶然。二戰後相當多新獨立的國家模仿這個體制，總該有點歷史規律。社會主義制度產生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原理。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斯大林也由衷贊同。按杜潤生老的回憶，毛澤東說他“也想搞呢”。但原理並不包治百病。究竟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多少是遵循原理、主義使然，多少是面臨困境的探索，我覺得更可能是後者。

除了張木生講的當時國際環境壓力外還有必須面對的，最重要的是全民共識。對後起工業化國家，尤其是遭受百年工業國欺凌的大國，

---

<sup>16</sup> 即前面提到的 2011 年 6 月 22 日李偉東、楊帆組織的“國際經濟形勢與中國發展戰略研討會”——作者註。

快速完成工業化是全民共識，無論左右，哪怕勒緊褲腰帶。可以說，什麼主張和方法能讓該國工業化速度最快，什麼主張就是好主張，符合人民願望的主張。哪個黨能完成這個任務，哪個黨執政就合情合理又合法。

農業國窮，積累率低。積累率低投入工業化資本就少，於是更窮。發展經濟學將後起工業化國家在市場經濟中必然面臨的問題稱之為“低水平均衡陷阱”。打破這種“陷阱”兩條路：一是外資投入，一是反市場規則政府強制投入。那時並不存在發達國家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實際上只有一條路可走，尤其對大國。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講還有這樣的“誘惑”：新民主主義的提出，與判斷中國近現代產業中私人資本會佔主導有關。1920年民營4.5億資產，接近公營的四倍。國民黨統治時期，政府主要通過參股銀行擴大了公營資本。抗戰前夕除了西方資本外，在國民黨統治區民營資本為18.89億元，官營5.71億元，官營約為民營三分之一。抗戰爆發，六百家民營西遷，但損失慘重，而且國民黨發“國難財”，官僚資本上昇。留在日佔區的，均被日本強制合資。日本投降，蔣介石“下山摘桃子”，將淪陷區產業均冠以“日偽資產”，大量被沒收。到1948年全部交通、工業中，外國資本佔11.2%，官僚資本佔64.1%，民族資本佔24.7%。如果算上金融資本基本被四大家族控制，民族資本佔近現代產業不足20%。到1950年除了跑掉部分外國資本外，共產黨順手牽羊，國有資產佔到75%以上。蘇聯援建項目可都是給國有的，到1955年社會主義改造前，國有資本在近現代產業85%以上，私有資本也就剩下個尾巴。這麼大的國有經濟必須有計劃。把殘存的私人資本全部納入國有經濟誘惑很大，難度卻很小。至於保留“資本主義尾巴”是不是更有利另說，但當時大勢已定。

比較選擇這種體制與選擇其他體制的最終發展結果，是評價這種體制的惟一標準。

1928 年，新經濟政策實施的第七年，蘇聯工業產值仍不到德國一半、美國八分之一。五年後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蘇聯變成工業國，再過五年工業產值世界第二、歐洲第一，成為世界工業強國。

中國工業化進程也一樣，1952~1955 年，中國第二產業產值佔 GDP 從 20.9% 上升到 24.4%，份額年均上升 1.16 個百分點。工業化目標遠得很。僅僅過了三年，第二產業產值比重達到 37% 並超過農業。大躍進的失誤造成工業增長走了個馬鞍形，但 1965 年開始一直超過農業，並在整個 70 年代保持在 42~48%。<sup>17</sup> 按 1955~1965 年計算，第二產業佔 GDP 份額每年增長 1.8 個百分點，比計劃經濟前速度高出 55%。

是不是“好的工業化道路”與條件接近但未採取中國模式的國家做比較更為準確，印度是最合適對象。1949 年印度工業化水平高於中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印度，50 年後的 1999 年，第二產業比重才達到 24.2% 並超過農業，<sup>18</sup> 實現初步工業化，相當於中國的 1958 年。就部類齊全這個標準看，印度至今還沒達到中國 60 年代水平。

當然，現代化不僅是工業化，除了包括農業等，還包括教育、人文、衛生的現代化。集體經濟確實會影響“積極性”，但強有力的組織和集體投資主體卻徹底把混沌數千年的農村社會翻騰個底朝天，直接把農民推到現代化大潮中。1975 年中國初中毛入學率 88%，而同期印度和巴西為 26%，韓國為 56%；1957 年中國嬰兒死亡率下降到 109‰，印度 1980 年還未達到這個水平（中國 1980 年 39‰）。1970 年中國人文發展指數超過 0.5（印度在 1950 年高於中國），從此進入

---

<sup>17</sup> 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 2000 / 國民經濟核算 / 國內生產總值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sup>18</sup> 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 2002 / 國內生產總值三次產業構成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自然增長率下降通道，印度到新世紀才達到這個水平。<sup>19</sup>

就算農業也沒想像的那麼差。實際上中國自 20 世紀後 50 年糧食總產一直在一個高速增長的通道中。1949~1999 年糧食年均增長 3.05%（1999~2009 僅為 0.43%），其中前 30 年年均增長 3.65%，後 20 年為 2.15%。都說剛一實行承包中國人就吃飽了。把 1982~1983 年的人均糧食 364 公斤折合成五個燒餅。1949 年 209 公斤是三個燒餅，1970 年 289 公斤四個燒餅，1979 年承包制開始前的 340 公斤就折合四又四分之三個燒餅。總不是最後一口燒餅吃飽的吧。<sup>20</sup> 糧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下降，80 年代初本來就是要吃飽的年代。

無論蘇聯還是中國，甚至包括一些附庸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速度和農村現代化速度遠遠高於同期發展中國家是歷史事實。

真扒一下統計年鑒，會知道前 30 年多數產品年增長率均高於後 30 年。當然，這與工業化初期增長率偏高有關。有人問過我：“計劃經濟好還是現在好”。我回答說：“這就像你生下來吃奶，現在吃牛排。你不能因為牛排吃著香就責備你媽生你後為什麼只讓你吃奶，也不能因為吃奶期間長得最快現在還嚷著要吃奶”。

現在看來，1955 年前後國有經濟在近現代產業中比重已經佔優勢，並控制國家經濟命脈。蘇聯援建項目完成後，國有經濟會佔絕對優勢。這種預期下，在輕工、零售、服務業等領域裡保留私有經濟也許是更好的選擇。這些保留部分會加大計劃制定難度，干擾計劃實施，但也會保留一個競爭態勢。把資本主義尾巴徹底割掉，計劃經濟絕對權力，就會忘乎所以。這應該是大躍進失敗的原因之一。同時，合作化建立在保存小農家庭經濟，承認小農佔有土地的基礎

---

<sup>19</sup> 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 1996 / 教育、科學、文化 / 各級各類學校招生數；國際數據 1998 / 中學生入學率（<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sup>20</sup> 楊松林：〈最後一口燒餅〉，烏有之鄉網站 2008 年 10 月 6 日（<http://www.wyxsx.com/Article/Class19/200810/53118.html>）。



上。既然認識到“小生產無時無刻不產生資本主義”，就該知道農村家庭經濟的頑固性和合理性。合作經營保留小農家庭經濟，附加一個合作經濟，既能發揮小農積極性，又縮小了小農成為地主資本家的空間，應該到此為止。人民公社把小農生產資料收歸集體，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民經營積極性。人民公社初期連生活資料都收歸集體，是發生那次災難的根本原因。如果當時農村現代制度停在1956年的高級社階段（部分退回到初級社都可以），也不會有後來激烈的反復。這都是馬後炮。

重歸新民主主義不是因為我們“走了一段彎路”，是因為中國目前面臨的種種問題讓我們不得不做出的選擇。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成績也不是靠抹黑和羞辱前30年證明的，而是與其他國家發展對比證實的。還不能忘記沒有一個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沒有數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農民，不見得是中國成為西方產業資本的主要轉移目標。把1956~1979年的中國社會叫什麼不重要，讚揚或者斥責也沒用，因為沒有人能把中國拉回那一時期，計劃經濟加集中制是當時的中國在當時的世界環境中的一種最優選擇，但不見得是今天的最優選擇。

重提新民主主義的原因也不是根據“主義”理論推演來的，不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是燙理論剩飯，而是根據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環境、中國社會經濟面臨的問題提出的。

新民主主義的往前走會是什麼樣子，那時候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樣子，也只能根據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矛盾來決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一定不是“三大改造、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如果全球政治經濟的基本矛盾沒有本質變化，中國面臨的問題從長期看總要通過消除私有制來解決，社會主義依然是新民主主義的方向。

## 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

在介紹了朱厚澤先生的三問後，吳思先生自己提出兩問。第一問是“中國是半封建社會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封建嗎？”吳思先生也注意到歷史學者都質疑中國古代早已不是標準意義上的封建社會。他這一問與其是質疑新民主主義論，到不如說是介紹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官家主義’是對秦漢以來中國社會更確切的命名”。理由是“秦漢之後，在第一線‘主義’的，當家做主、立法定規的，除皇帝外，還有各級衙門和大小官吏。他們各有各的地盤。皇帝有王法，各級衙門有部門法規、地方法規和‘土政策’，官吏個人也能倚仗他們代理的皇權建立潛規則。”

吳思先生的這一問和一答有自己的道理，但都有些勉強。

首先，無論共產黨、國民黨還是當時的學者，對古代中國通用“封建社會”。但從來找不到他們認為古代和當時的中國用分封制、莊園經濟、諸侯割據政治的描述。封建這個名目下，他們都是用小農經濟、宗法社會、中央集權等詞語來描述，都認為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貧農的矛盾，焦點是土地問題。只要這些描述和判斷不錯，用什麼詞並不重要。無論孫中山還是毛澤東，“耕者有其田”都是解決中國基本矛盾的主張。所謂反封建，就是反地主富農過度兼併土地，造成大量農民生活無著的社會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孫中山還是毛澤東都沒說錯。

那麼吳思先生這一答怎麼樣呢？我看有些跑題。新民主主義論反的是封建“制度”，不是封建“主義”（大概只有李斯和秦始皇反過“封建主義”）。而且“主義”不等於“當家作主”，不是誰在“立法定規”，而是主導事物的意義。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包含很多內容，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其中經濟制度是根本。封建一詞也不僅指封藩建衛，還包含土地制度、各階級身份、分配規則、邦國與中央的行政管轄關係、文化取向等一系列內容。不僅僅是中央地方關係，

秦以後中國，包括土地自由買賣、小農自由身份、市場經濟、中央集權和獨尊儒術等內容，僅僅用“官家主義”一言以蔽之並不確切。

張木生說所有國家都是官家主義，意思是指國家成立後，代表國家的政府總是擁有最高權力。吳思先生辯解“西方中世紀就不是”，有些繞圈子。歐洲中世紀確實王權沒有中國強，但分封貴族也屬於“官家”，行使行政權利，他們不是“民家”。中國古代與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別不在於是否官家主導，是中世紀西方不是現代社會制度，缺少中央集權和自上而下的行政組織，而中國是。

一個社會究竟“官家主義”是常態還是“民家主義”是常態，或者究竟哪個更先進？恐怕還是官家主義是常態，更先進。蘇聯解體後一段時間，俄羅斯確實是“民家主義”。八個寡頭擁有國家資源的一半，控制國家主要媒體，他們說什麼政府只好聽什麼。結果俄羅斯不是“崩潰邊緣”，而是基本崩潰。普京上臺大打出手，把“民家主義”給打下去恢復了“官家主義”，俄羅斯才有戲。如果非要扯上主義，批判官家主義的立場恐怕更接近無政府主義。

那麼中國古代社會更接近什麼“主義”呢？是什麼制度呢？如果嚴格按照各種現存“主義”和制度的定義看，中國古代社會更接近“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

百度百科上解釋說資本主義是一種制度，“這樣的制度下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料都歸私人所有，並借助僱傭勞動的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利潤。在這種制度裡，商品和服務借助貨幣在自由市場裡流通。投資的決定由私人進行，生產和銷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業控制並互相競爭，依照各自的利益採取行動”。按照這個定義，中國古代社會比任何社會都更符合標準。

秦漢以後，中國主要生產資料——土地歸個人所有，自由買賣。中世紀歐洲不是這樣。中國地主、富農、商業和作坊按照市場經濟規則僱傭勞動，或者租賃生產資料（佃租）獲取利潤。一批小農和手工

業者也是市場參與者。“利潤”完全來自以上渠道，這與 1500 年以來的西方資本主義不同，後者相當一部分利潤來自對其他民族的非經濟剝奪。古代中國主要行業的投資、商品和服務交換是私人決定，以貨幣為媒介按市場規則完成。政府只在少數關係國家財政的行業領域（鹽鐵銅專賣）施行不定期的壟斷經營，但這並不妨礙市場經濟的性質，西方國家至今也幹這些。

以上判斷都能通過豐富的史料得到證實。<sup>21</sup>

有人會說：這樣的判斷有什麼意義嗎？不就是咬文嚼字嘛。其實做這樣的判斷對今天的世界有很大的意義。假如數千年來只有中國經歷過兩千年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兩千年的市場經濟，那麼中國古代史就為認識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運行規律提供了惟一具備觀察價值的史料。西方真正擺脫中世紀形態進入所謂“資本主義社會”和市場經濟至今不過二百年（許多國家才一百多年），連中國一個 270 年左右的標準朝代週期都不夠。可以說一個輪回都沒走完，哪裡具備“實驗條件”？不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和規律”，妄論市場經濟。這就像看到蠶由子成蟲，由蟲做繭，以為這就是蠶。但沒見過破繭成蛾，由蛾生子，所有論證都蒼白無力。

當然，本文去完整敘述中國古代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以及對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趨勢的啟發顯得局促。王小強博士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前四部分用 20 萬字尚未說完。可惜現在主流學者以震耳欲聾的沉默對待這些研究。

## 說說權利制約

順著官家主義的思路，吳思先生判斷現在中國依然是官家主義，

---

<sup>21</sup> 王小強：〈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1~4，香港大風網站(<http://hkstrongwind.com/>)。

應該“把君主或官主改為民主”。

“民主”這個詞現在成了個熱門詞彙，是普世價值最推崇的概念，也是中國主流精英掛在嘴上的武器。有意思的是這個詞在 20 世紀 60 年代前還是現秩序的造反者的主要旗幟，而今天倡導民主的當時最討厭的就是這個詞。今天，就算最討厭美國的人也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好，別的學不學再說，美國民主總不能不學。

民主在今天是個含義非常混亂的政治詞語。它經常被應用在不同範疇裡。說“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時，民主是普通老百姓籠統的“政治願景”；說“民主就是普選制”時，民主被限定在政治生活中的“確定領導人的方法”；說“民主就是票決重大公共事務”時，民主就成為確定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選項的規則。正是民主這樣被濫用在各種範疇中，才方便論證“民主是個好東西”。

如果認真討論這個概念，民主只能在政治制度範疇討論。第一種民主無法討論，第二種民主範疇太窄。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離不開歷史，因此什麼是民主，只能從人類社會存在過的政治制度及其關係來認識，否則民主就容易成為打人的“棍子”。

如果說人類政治史是從集權專制走向民主，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那就必須解釋為什麼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公民社會、票決民主就已經存在，雅典公民幾乎每週對各種公共事務採用全民公決，還有五百人的議員分幾撥準備議題，體制設計實用高效。為了避免作弊和干擾，斯巴達人甚至用抓鬮在全體公民中推舉監察官。這比今天的西方民主更能體現“民意”。歷史沒有發展，自然說不上終結。

批判西方民主的人一般用西方民主本質上是資本的民主，受資本左右做論據。但有人注意到這樣的歷史現象：

西方的“民主祖宗”生存方式有些怪：按照當時十個奴隸的剩餘價值才能供養一個雅典人悠閑生活的生產力狀況，雅典十萬奴隸顯然不能滿足 15 萬雅典公民和他們家屬过上悠閑富裕的生活。五萬雅

典公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控制整個地中海霸權貿易的雅典海軍中通過做槳手、水手、水兵和當殖民地駐軍“就業”。同時有六千個人民陪審法庭的陪審員，五百名議員和 1300 名官員等就業崗位，每天能領到兩個奧波爾（一個奧波爾大約可以讓一個家庭生活一天，或者嫖一次娼<sup>22</sup>）的薪水，也就是大約 40% 的雅典人在為國家服務中就業。雅典人每週數次觀看的戲劇、音樂和各種比賽不僅不要票，而且也發補助。雅典人勞動，但前述收入不會小於他們收入的 40%。雅典國家怎麼有這麼多錢呢？五萬雅典人直接統治色雷斯等兩百萬人口的五個殖民地，軍力控制的整個地中海、黑海涵蓋兩千萬人口。阿里斯托芬告訴我們，數百希臘城邦要給雅典上繳“貢金”。當然還有海上霸權貿易，一個雅典貴族寫到：“雅典人阻止對手將商品轉運到除阿提卡以外任何其他國家，否則她就威脅將對手完全從海洋上驅逐出去”。沒有這些，雅典人就既無能力又無興趣過民主生活。不足一萬斯巴達公民按軍營方式生活，以國家名義奴役 15 倍的美塞尼亞黑勞士和五倍的皮里阿西人給他們供應糧食、服裝和武器。這是他們成為公民社會、發明拒絕作弊的抓鬮民主的前提。取代雅典霸權後，雅典人的生存方式就成為他們的生存方式。<sup>23</sup>

古羅馬公民什麼勞動也不參加，主要從事鍛煉身體，軍事訓練、打仗、看戲、泡澡。他們的公民社會和共和制度靠通過暴力維護一個奴役整個地中海沿岸和大半個歐洲的世界秩序存在。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這樣概括羅馬人的生存邏輯：“對人民來說戰爭幾乎永遠是一件快意的事，因為戰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們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sup>24</sup>

---

<sup>22</sup> 蘇振興：〈古希臘娼妓制度探析〉，百度文庫 2011 年 1 月 11 日（<http://wenku.baidu.com/view/9c0d27333968011ca3009138.html>）。

<sup>23</sup> 威廉·弗格森：《希臘帝國主義》，超星讀書網電子版圖書（[http://read.chaoxing.com/ebook/read\\_11527899.html](http://read.chaoxing.com/ebook/read_11527899.html)）。

<sup>24</sup> 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商務印書館 1962 年。

古希臘和古羅馬人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與他們這種生存方式有聯繫嗎？

從邏輯上講，如果公民分為生產資料佔有者和無產者，那麼完善的票決民主結局一定是“多數人暴政”。因為窮人總是佔多數。如果議案屬於博弈性質，一方所得一定是另一方所失，這個結果是一定的。這可以從美國獨立後邦聯時期的政治生活得到佐證。只有附加一個條件：全體公民都可以從國家力量於其他國家或民族攫取大量財富以沖淡議案的博弈性質，使無產者也樂於維護這個雖然是富人當家的國家制度。當然，財富多到實現“中產階級化”最方便。也就是說，曾經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以用國家力量攫取其他民族財富、使國內公民趨於中產階級化為基本條件。

古希臘和古羅馬顯然是這種情況。雅典人、斯巴達人、羅馬人都是公民社會，所有公民在政治權利上基本平等。但是，他們的公民權很吝嗇，只給極少數人，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也不算，不要說其他城邦或民族了。這些曾經實行過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的國家中，真正的公民從來沒有超過境內人口的5%，如果把他們奴役的地區全加上，恐怕百分之一都不到。也就是說，歷史上的公民社會享受民主權利的人只佔實際經濟系統總人口的極少部分。

同時，掠奪財富的分配一定不能是貴族等少數人佔有，不能打仗靠我拼命，分錢卻沒我份兒。因此無論雅典還是羅馬民主制的建立都與平民拒絕為國服務有關。雅典的重裝步兵拒絕參戰和羅馬平民數次“撤離運動”促進了民主共和體制的產生。夏秋放牧冬春搶劫的草原民族大都實行軍事民主制度並有公平的贓物分配制度。搶了的東西都歸皇帝、貴族的亞述帝國就不長命。由此看，歷史上的民主制度是靠掠奪其他民族財富生存的民族最優政治制度選項。

那麼再看現在存在著的民主制度，我們會發現標準的自由民主國家大都符合這三個條件：必須從其他國家攫取財富實現中產階級

化；享受公民權利者佔他們生存所必要的經濟系統總人口的很少部分；如果不實行票決民主制度，國內矛盾會加劇。美國最典型。

這是實實在在存在過和存在著的民主制度及其與經濟、文化的聯繫。研究民主制度只能以此為對象，否則就是嘮叨“政治願景”。

與民主對立的制度是專制制度，也就是沒有全體公民通過票決決定重大公共事務，而是由少數人內部決定的政治制度。這樣的政治制度也有豐富的歷史例證，其中中國就是典型。

思考古代中國為什麼一直大一統、中央集權，還不如先問一下它為什麼沒產生過民主制。其實一條就夠了，就是在私有制情況下，如果財富來源是本民族創造的，那麼少數擁有資本的人必然多得，多數人必然少得。這種情況下如果票決重大公共事務，比如說究竟地租該多少、利息該多少、最低工資該多少，肯定形成“多數人暴政”，堅決侵害少數富人權益。更不要說誰提出個“重新分配生產資料”的議案了，那不動刀子才怪呢。因此，類似古代中國那樣的經濟體制，民主政治是最差選項。

美國政治史對此提供了典型例證：美國獨立後的邦聯時期各州一院制的議會最符合民主的本義。當 13 個州中有七個州按照“人民的意願”通過發行了紙幣，幫助負債累累的窮人“賴賬”的議案時，富人們驚呼“倘使民主分子多分得一些立法權，即讓他們在立法機構中起支配作用或佔優勢……他們就會通過表決剝奪你們的財產”。<sup>25</sup> 這種民主制度顯然不適應尚未能剝削其他民族財富的美國人的生存方式。對此，漢密爾頓說得很明白：“所有的社會都分成了少數派和多數派。少數派包括富人和出身名門的人士，多數派包括人民大眾……應該使少數階級在政治上享受特殊永久的地位。他們可以組織多數階級的騷動……人民！人民是一個大野獸！”麥迪遜的看法也是這樣：

---

<sup>25</sup> 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商務印書館 1994 年。



“一般生活艱苦……人的數目，一定會超過與貧窮絕緣的人。根據平等選舉的原則，政權必然會落入前一種人的手中……應該組織這樣的政府，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的侵犯”。<sup>26</sup>

一個相對獨立、私有制、貧富分化明顯的經濟系統中，政治制度一定是專制，即代表少數富人利益，即使表面上有議會制度、有選舉，在實際操作上一定會實現“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的侵犯”。這個道理，美國偉大的聯邦憲法制定者早已不加掩飾地告訴了我們。只有理解了已經存在過和存在著的民主政治的條件、原因，才會對中國究竟能夠實行什麼政治制度有點感覺。

我們回過頭來思考一下吳思先生提出的問題。吳思認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沒有脫離“官家主義”，不是“民主主義”，“民主革命的任務，無論新舊，主要是把君主或官主改為民主”。“民”主的民究竟該是誰呢？他指出“這個社會仍然由官家即權貴主導，而不是資本主導”。<sup>27</sup> 吳思先生這句話是不是包含“資本”就代表“民”，“資本主導”就是民主主義呢？不知道，但倒是很直白，沒違反美國聯邦憲法起草者的原則。如果能引用麥迪遜“應該組織這樣的政府，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的侵犯”原話，告訴大家民主導就是資本主導，就更周延了。

吳思先生介紹了姚立文先生的看法，說“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通過黨內高層運作，取代了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在黨的信仰和人民意願出現矛盾的時候，信仰本位壓倒了人民本位”。<sup>28</sup>

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信仰社會主義，這不僅僅是毛澤東，而是整個共產黨。共產黨是個有信仰的黨。信仰是對超驗認識（或者叫假說）的選擇和持有。信仰是個雙刃劍。沒有信仰找不到方向，

---

<sup>26</sup> 漢彌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

<sup>27</sup> 吳思：〈新民主主義在當代的問題與出路〉，《中國改革》2011年第7期。

<sup>28</sup> 吳思：〈新民主主義在當代的問題與出路〉，《中國改革》2011年第7期。

混亂踟躕心裡慌，尤其在“我們在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的時候；信仰明確堅定，走對路了皆大歡喜，走錯路了更加危險。因此，一般性地批判或褒揚信仰很難說明什麼。

自從有了國家，政府就凌駕於所有百姓之上，掌握老百姓都不許掌握的公權。古今中外無不如此。所謂制約權利，就是不能讓政府用公權為自己謀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私人資本、外國資本，國有資本也有“權貴化”趨勢，這些都是強勢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工農逐漸成為弱勢。假如存在政府公權異化，也都是與這些強勢力量交易。這是這種社會形態的基本政治格局。任何制約政府權利的主張都不能空泛，都是對著具體政治格局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民”理解為“資本”，或者每次出現公權異化只指責官而不指責“民”，不把工農缺少表達意願能力、缺少行使權利手段的實情說出來。這樣不僅不會降低公權異化，反而會助長公權異化。制約公權異化，前提條件是給佔人口大多數的工農群眾以表達意願的渠道、行使權利的手段。

這是吳思先生沒有說清楚的。

## 對重提新民主主義的看法

讀《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全篇基本是對中西歷史文化的重新敘述，五百頁的書最後 50 頁才涉及到今天的中國，其中大部分還是擺阻礙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那些問題以及看法，沒有注意到有什麼“重歸新民主主義”的主張。看到圍繞這本書的視頻和一些研討會在討論新民主主義還覺得很奇怪。重新翻一下書才發現，也就是全書最後一句有“為什麼在社會、政治改革上，不試一試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提出，劉少奇實踐的新民主主義？”一段文字。像我這種讀書不求甚解的還真注意不到。真沒想到還有這麼認真讀書的人，更沒想到就這一句話能讓這麼多知識精英這樣亢奮。

說心裡話，我並不看好被重提起的新民主主義主張的最後結果。因為已經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法，新民主主義似乎是“燙剩飯”，更像是“倒退”——都社會主義了，哪怕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也比新民主主義更高端呀——這會是多數人第一個想法。也料到肯定會有人出來“商榷”，因為新民主主義畢竟主張“節制資本”、“共產黨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但是沒想到爭論會這麼激烈。這場爭論倒讓我重新讀了70年前共產黨的這個主張，對照今天中國和世界面臨的問題，覺得這個主張最後叫不叫新民主主義不重要，但確實是很有價值的主張。

擺在我們面前的幾個重大難題很明顯：從國內看，日趨嚴重的貧富分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繃緊，虛擬經濟加重，腐敗屢禁不止；從國際看，虛擬經濟面臨信用崩潰威脅，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緊圍堵中國。兩者作用的結果造成中國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方式嚴重受阻，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受到威脅。

從共產黨領導下中國62年發展經驗看，沒有過不去的坎。中國共產黨總能認清形勢、理清思路，調整方針路線，帶領全國人民取得新的勝利。我對此並不擔憂。所憂慮的只有一個：“不爭論”20年了，黨內和社會上思想路線已經有些混亂。雖然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但思想界無論左右都在繞開這個理論提出自己的主張。主流媒體和思想界精英的大部分人傾向於在經濟上與西方接軌後，要求在政治制度上、價值觀上與西方接軌，並不買“四個堅持”的賬。一些老理論家堅持用傳統馬克思理論解讀當前現象。一些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的思想主張也很明顯。尤其是體制內的學者和官員在闡述一些問題時也很難用特色理論實現自洽。其中最典型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包含初級階段理論的特色論都沒有包含對中國經濟制度變更後的階級狀態和性質進行描述，以“人”或“民”一言以蔽之。實

際上，既然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總要產生資產階級，這是無法迴避的問題。理論一定意義上就是解決名與實的問題，名不正則言不順。不承認資產階級的存在，實的“資”就只能名以“民”。於是有“國進民退”、“與民爭利”的指責，而官員也只好小媳婦似地解釋“實際上沒有國進民退”。理論連憲法總綱第七章裡“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黨章總綱裡“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內容都無法照應。“開發商”雖然也是“按行業分類的人”，但本質是資本家。資本家怎麼會流有錢不賺的道德血液？名民實資的“民”恨不得主導一切，好像達不到蘇聯解體初期那個“民家主義”地位不算完。不給各階層以名副其實的名，既認識不清也說不清經濟社會問題，更化解不了理論紛爭。

第二，雖然起點高，但是方向含糊。十三大報告比較完整敘述了初級階段理論。開篇第一句是“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起點很高。後面論述五個特性，四個與以前提法沒明顯差別，一個“變為商品經濟高度發達”是方向。誰的“商品經濟高度發達”是很明白的，於是有了“接軌”之說。到90年代中期以後，“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算再也達不到了，無論市場化走得怎麼快，都指責“市場經濟倒退”。於是所有“改革深化”的方向就只有比照西方一條路。現在一般人都認為經濟制度方向就是西方體制，政治體制改革不往西方體制走理論上說不通，只能用“中國不走西方民主”的宣言方式來解決。

第三，對鄧小平理論涵蓋不全。《鄧選》對改革開放的結果指出了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現共同富裕”，一種是“如果導致兩級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如果意識到確實有兩個可能性，就該在初級階段理論裡把這點說到位。目前兩極分化加劇與沒說第二個可能性不無關係。

第四，缺少對全球基本矛盾的闡述。初級階段論和特色理論主要是講述國內問題，對外只講了對外政策，缺少對全球基本矛盾的闡

述。對與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或者原來講的三個世界的性質、矛盾、它們之間關係，都沒有闡述。“和平與發展”、“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和平崛起”都不是性質判斷而是策略表述。缺少這部分內容，對外經濟、外交政策就沒有理論指導，變成就事論事。對“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就無法論述。最主要的是，中國已經深入全球化進程，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攪在一起，“中~美國”了。連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特點都說不清楚，調整國內政策必然沒有著力點。

從以上分析看，初級階段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需要進一步完善。只有進一步完善，才能在理論上指導黨員幹部認清問題的本質，找到正確解決矛盾的辦法。好在中國共產黨總是能在關鍵時刻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引導全國人民的旗幟。

從這個角度看，張木生的重歸新民主主義主張提得很及時準確。這樣說並不是非要打出一個新旗幟，估計張木生也不是這個意思。新民主主義論所描述的社會狀態、矛盾性質、政策主張倒真是與當前面臨的問題很貼近，而且新民主主義本身是個相對完善的主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完善的最佳範本。

至今飄揚在上空的五星紅旗，大星共產黨，四個小星依次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毫不含糊地給了民族資產階級以合法政治地位，名正言順。明確了資產階級屬於人民一部分，與其他公民權利一致，受憲法保護，不僅理論上可以自治，而且會讓資產階級安心扮演他們該扮演的角色。

新民主主義雖然也搞市場經濟，但主張節制資本，並提出了社會主義方向。節制資本是三民主義主張，國民黨二大主張“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新民主主義論更把這個

內容提昇到民權主義“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高度，與此後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提供了出口。雖然照搬新民主主義論內容與現在情況不符，但這個精神還是需要堅持的。提出節制資本的思想，才會找到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讓改革開放只有成功的可能性而沒有失敗的可能性。節制資本，方向是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領導才有依據。這樣理論才自洽。如果理論一直混亂下去，西化先鋒本來就是媒體寵兒，粉絲成群，出現大的動蕩捂都捂不住。

新民主主義論有大段關於世界矛盾性質的論述，這些論述到現在雖然詞語有些老，但對時代性質的基本判斷依然適用，而且用現代話語體系照樣能說清楚。中國已經深入全球化體系，認清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基本矛盾和走勢，才能制定保障中國利益的政策。

用“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概括新民主主義並不準確，重提新民主主義也不是為了給共產黨繼續執政找合法性，而是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用新民主主義的主張更能有效解決，同時新民主主義作為最低綱領有明確的方向性，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一步完善的範本。

在研討會上，張木生對新民主主義在制約公權異化、增強國有經濟的全民共享措施等進行了簡單介紹，但未全面展開。

關於這場PK，總的印象是很新奇：2004年的郎顧之爭使爭論公開化之初，此前一直佔上風的主流學者一時有些緊張，但很快就對左翼思想不怎麼在乎了，似乎找到了辦法：自說自話，死不接招，用震耳欲聾的沉默就足以應付。可這次不同，張木生幾十萬字書最後一句說的話，竟然驚動了體制內外的高階精英，紛紛要求“對話”。原因其實很清楚：用新民主主義基本精神能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理論自洽。這比用《資本論》原著論述現實問題，用聯共黨史的教條做未來主張，要可怕太多！